



摘要 周馥从1871年至1894年在直隶任职期间,对永定河、金钟河、北运河、潮白河、大清河等直隶河道进行勘察和治理,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周馥治水,重视调查研究,注重保护百姓利益。其治水成功,使直隶地区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水患漂溺之苦,对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关键词 周馥 直隶河道 治理

周馥(1837—1921年),字玉山,别号兰溪,安徽建德(今东至县)人。他早年加入李鸿章的戎幕办理文案,深得信任与倚重。1871年,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周馥亦随行至天津。从此与治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从1871年至1894年,周馥对永定河、金钟河、北运河、潮白河、大清河等直隶河道进行勘察和治理,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。

周馥治理直隶河道是从永定河开始的。永定河上游流经黄土高原,含沙量仅次于黄河,故又称“浑河”、“小黄河”,下游淤浅,排水不畅,水患频仍,“直隶各河,唯永定河号称难治”。

1871年夏秋之际,直隶境内“阴雨连绵,数月不止,河水盛涨,奔堤决口”。仅永定河就漫决30余处,畿辅东南,几成泽国,造成数百年罕见之水灾。

收稿日期:2000-03-26

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甚感治水人才匮乏,特命周馥襄助治河。周馥为了掌握治水的第一手资料,首先对永定河流域进行了详实考察,发现河水流向直趋东南,而大堤一直向东延伸,整个河长仅200余里,上游和下游宽却几里甚至十几里,中游又太窄,仅有一里或半里宽,这样一来“水涨则溢,水落则淤,淤必复溢”。针对这种状况,周馥提出了“改道东趋,放堤使宽”的治理主张。该主张着眼长远,标本兼治,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,但因牵涉面广,工程量大,未被政府采纳。周馥又提出了权宜之策,即选择永定河险要地段,修筑石堤。不过,这一建议又因朝廷财政拮据而未能实施。周馥治理永定河的种种方案均胎死腹中,但他征服水患为民分忧之决心始终没有改变。在此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,永定河道几乎连年溃决,甚至一年数决,每次漫决之后,周馥都克服种种困难,排除种种阻力,策划治水方案,堵合决口,整治河堤。

周馥治理永定河一大成就是1890年在河北岸

上周厉王采取堵塞民口的“弭谤”政策,导致于无声处起惊雷,国人暴动的事实,使孔子和许多有识之士从中得到“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”,川流尚不可塞,民口岂能去堵的警示。加之孔子所处的观念社会中,“有为”与“无为”的激烈思想斗争,以及孔子教学实践中的体会等,孔子金声而玉振之,将其集中起来,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,从而提出了“中庸”的思想。

万方数据

另外,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多次赞颂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伟大历史功绩,缅怀他“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,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的奋斗和奉献精神,并奉大禹为“吾无间然矣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的仁人、圣人。这一方面表达出孔子对大禹那样的英雄圣王的崇敬,也说明孔子已从思想上把除水害、兴水利的治水活动视为治国安邦的大事。

添建石堤。“(光绪)十六年,大水,畿辅各河并涨,永定北上汛、南三汛同时漫决”。数百里一片汪洋,被淹地区甚广,“本年水势之大,永定受害之重,殆自同治十年后所仅见”。周馥亲赴永定河堤督工,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,将决口堵合。堵合堤决是一种权宜应急之计,若要河堤永保安澜,造福百姓,必须采取更为得力的措施,周馥通过对河堤的考察,发现永定河底高堤薄,两堤由沙土筑成,险工林立,“若遇盛涨,仍无把握”。周馥参照古人治水经验,结合永定河的实际,提出在永定河北岸大堤添建石堤,并称此议“洵为防患未然一劳永逸之计”。建筑石堤“工艰费巨”。为了节约筑堤费用,周馥精心设计治理方案。当时若使用大块条石,成本高、耗资大,周馥遂改用不规则的片石,垒砌成堤。此外,周馥还采取了“分段择要举办之法”,选择险情最严重的堤段先行添筑石堤。永定河北岸石堤建成后,“自是北岸无水患”,对保卫京师的安全起了极大的作用。

周馥治理永定河另一大成就则是修建芦沟桥减水石坝。永定河两岸皆沙,河水经历冲刷,河床增高,易致溃决。1893年,永定河南上决口堵合后,许多大臣以第二年为慈禧太后60大寿之年,近畿不宜见灾为由,提议挑河挖沙以防水患。周馥认为挑河之法,既劳民伤财,又无济于事,“河沙不知几万斛,安有如许财力挑尽,且旋挑旋淤,曷有已时所排之沙,又将堆积何所?自古治浑河只闻束水攻沙之法,未闻挑河之法也”。不久,法国治水专家建议,在永定河上游怀来县河水入山口之外,筑一大石坝,以阻挡泥沙下泻,并放清水。周馥以为“拦河筑坝,功断难成。即成,而坝高泥沙亦高,滔滔不已,安有留浊放清”?经过实地考察,并凭籍多年的治河经验,周馥断言:“今河患在堤决水浅,水无所容耳,专事修防无济也,中游濬减水亦无济也。”只有在芦沟桥南岸建一座减水石坝,使永定河盛涨时能分水入大清河,以减少水患,这样虽不能保证岁岁平安,但也可保证10年中有八九年不决口。当时,有人担心,这样会使大清河受害,周馥则不以为然,他认为“两水异源,永定涨,未必清河同涨,而永定只减坝顶上多余之水,不过半日一日至久二日而止。多减且恐多溜,其不及坝顶之水,自应仍循正轨穿芦沟桥而东以涮河身,纵使西淀难容,清河遭决,而两害相形取其轻,何不可之有”。这个方案科学合理,切中了永定河之要害,“以该处建坝为釜底抽薪之计”。这个方案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。

为了尽快落实该方案,周馥殚精竭虑,认真实施。他聘请法国工程师吉礼丰前往芦沟桥两岸测量

水位,并请专人勘估工料,修防筑坝。为了赶在第二年大汛之前完工,周馥“昼夜以夜,喘汗不停”。1894年6月,工程如期竣工;“各工坚固整齐,布置如法,绝无草率偷减,是以宣泄盛涨,裨益工防”。石坝建成后,周馥十分惬意,吟诗道:“水落沙痕挂石栏,欲分清蜀奠狂澜,书生莫笑持筹拙,调剂盈虚自古难。”此后的18年中,永定河仅决口一次,还是埽料不足之故,而非石坝之弊。

二

周馥在直隶地区,除了治理永定河道以外,还对其他河道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。

1874年,“直隶永定、潮白二河再度漫决,沿河州县田庐被淹,收成减失,并有颗粒无收之处”。当时的治水官员采取“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”的办法,没有整体规划,缺乏长远目标,汛期再次来临时,又漫决成灾。周馥认为,天津为九河故道,如果不从长计议,进行大规模的疏导和治理,那么水灾永远也不会终了。于是他设置了文武汛官,专门负责治理水灾,整治了津沽入海的金钟河,北运筐儿港和通州潮白河。与此同时,周馥还上书建议:“天津为九河故道,不泄则水患莫瘳,请求上游辟减河而开屯田,南运下游分水势”。李鸿章赞成其建议,但清廷农工商部却搁之不议,结果不了了之。1875年,驻屯新城提督周盛传接受了周馥屯田的建议,在10年间于兴济及新城间开挖海河引水河3条,全长100余里;建造桥闸近30座,形成灌溉渠道网络,下灌小站盐碱荒滩,并招民垦田数千顷,使小站成为闻名遐迩的稻米之乡。其功劳“本馥议也”。

这一年,周馥还在北运河上建造一项减水工程。当时,北运河涨水时全赖青龙湾和筐儿港两条减水河分泄,但因其年久失修,水灾繁重,尤其是筐儿港,长年淤积,已成为平地,无法疏通。如何治理呢?周馥“若顺漫立水堤,则水宽无束,占田太多;若开一小渠,而以土筑两堤,盛涨必决,徒劳无益”。为了寻找一种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,周馥亲自到旧减河槽实地考察,并在民间进行了调查研究。在此基础上,决定在河淤的平地上南北各开一条小渠,中间留有半里宽的平地,用开南渠的土筑南堤,开北渠的土筑北堤。这样,水小时就从两条小渠流过,水大时则经过两渠中间,半里宽的河滩足以容纳洪水,水退后还可以在河滩上种粮。这个方案一举两得,既可免除水患,又不浪费耕地。该工程竣工之后,周馥十分得意,云:“四十余年之水患,一旦豁除,诚一大快事。此工虽不巨,而办法亦册籍所罕书之。”

畿南有南运河、北运河、子牙河、永定河、大清河五大河流,均汇聚天津海河注入渤海,其中南运河、北运河、子牙河各有“达津专路”,而大清河先与永定河合流“然后达津”。由于“清河之水清而弱,永定河之水浊而猛”,每遇暴雨河水盛涨时,清河下口就被永定河之泥沙淤塞,致使大清河“尾闾不畅,胸腹受患”。其水患亦较它河为甚。当时,有人根据朱熹“治水先从低处下手”的治水理论,建议在大清河下口南岸另开一新河直接入海河,与永定河水分道而行,“系为清浊各不相混”。周馥却不以为然,他认为,虽然朱熹的治水主张是至理名言,但在治水实现中不能硬搬教条,而应因地制宜。他经过实地考察,并总结了历史上治理大清河的经验教训,反对“引清南趋”的主张,其理由有三:其一,直隶一带地势北高南低,永定河则由西北流向东南,而大清河则由西南流向东北,“若清南让一步,则浑亦南滚一步”,这样势必危及子牙、南运等河流的度汛安全。其后果不堪设想。其二,永定河素有“小黄河”之称,泥沙极重,若辟新河,一旦永定河水暴涨漫决,新河北堤必遭冲决,这样,不仅会危及北运河堤之安澜,而且船只无法航行。其三,大清河在东淀以下地平水缓,如另开新河,泥沙不易下泻,若泥沙“竟淤而不涮,则千万年来,它不积成山阜”?所以,周馥提出,对大清河“只有随时补偏救弊,通筹上下游,而择要治之”。

对滹沱河的治理,周馥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。滹沱河源于今山西省境内,流经今河北省中南部,汇入子牙河,注入海河。1876年夏秋间,阴雨连绵,滹沱河漫涨,两岸百姓深受水灾之苦。怎样治理滹沱河?当明朝廷有人提出在藁城境引水沿原故道南流,在献县境引水南入冯家河的主张。

周馥为了寻觅治河之策,遂与清河道叶伯英对滹沱河进行了考察,沿河10余县察看。每至一处“详细履勘测量”,“博访勤搜”。力主滹沱河不能分水南行。滹沱河在藁城的流向是由西向东,其在历史上的故道是由北向南,计长185里,如果全部开浚,工程浩大,实非人力所能及,且开挖故道还损坏沿途的禾稼。滹沱河在献县境内是由西南流向东北,若引滹沱水入冯家河,则是横趋东南,从地势上看是不可行的,引滹沱水入冯家河首先要修筑47里堤坝,且须年年修守,耗费浩大,毫无把握。因此,周馥认为上述建议“害多利少”,“必不能行也”。而应因水制宜,进行治理。

三

直隶河道呈扇形公布,河床淤塞,狭窄弯曲,含

沙量大,灾害频繁。到近代社会,水患更为严重,“顺直水灾,年年如此,竟成应有之常例”。周馥在直隶期间,无论官位变异,职位升迁,都未停止对河道水患的治理,“殚精治河,不遗余力”。时人盛赞他:“其功德在民,尤以河工为最巨。”周馥治水的成功,使直隶地区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水患漂溺之苦,对促进直隶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周馥治水时,注重兼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,保护百姓利益。他认为“凡御灾之事,当努力为之”。1874年,在北运河筹筑南北两河时,就采取了“挖河筑堤所占之地应除粮给价,其河滩容水之地免粮”的护民政策。1877年在治理滹沱河时,周馥反对“改道南行”的方案,其原因之一是该方案极大地损害沿河百姓的利益,他指出:“思改道分流两无善策,与其耗财力与水争地而终为水所胜,不如保守两岸旧有之堤工而重恤河滩内居民。”1890年在堵合永定河北岸上汛漫口工程时,周馥就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招募遭水淹没灾区之贫民挑挖河身,堵塞决口,此举收到事半功倍之效,颇受百姓欢迎与好评。周馥这种“忍为灾黎惜负薪”的治水精神,正是其惜民护民之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。周馥作为地主阶级中的要员,治水时俯顺民情,趋应民意,珍惜民力,确实不易!究其原因,一方面他熟读诗文,深受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影响;另一方面,他本人从小参加田间劳作,比较了解、体谅民间的疾苦。

周馥治水,不拘泥于书本,而重视调查研究。周馥认为“拘于例”是永定河屡屡溃决的主要原因之一,他对那种囿于书本,而不重视实践的官员深恶痛绝,尝言:“从不出门一步,不知工段险要在何处,更不知河工修防为何事,虚糜俸饷,实堪痛恨。”周馥治水时,不仅重视汲取前人治水的成功做法,更注重实地勘察,躬督亲试。在直隶任职20年间,他遍历直隶河道,亲赴永定河、金钟河、北运河、潮白河、大清河、滹沱河等勘察水势,考察河堤,筑堤建坝。1874年,在筹划治理北运河时,他“单骑勘漫水所趋之路,而息田间问公民所以免患之方”。在河水暴涨河堤漫决之时,周馥又亲自指挥堵筑决口。1877年,周馥在治理滹沱河时,曾前往河堤“步步勘量”、“博访勤搜”。1890年,永定河漫决,周馥则率员前往河堤及漫口处连日察看河水情势,制定出“先堵合决口,再在北岸建石堤以护京师”的治理方案。周馥这种治水做法,正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,对我们今天治理水患,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。